

## 司徒雷登回憶錄《在華五十年》 中譯本的意識形態與政治

李明哲

文化操縱學派認為，翻譯文學可能與譯入語其他並存系統（如政治制度）產生連繫，從而採取特定的規範、行為和政策，生產出為政治意識形態服務的作品，所有翻譯都是為了服務某種目的而操縱原文。當翻譯活動受到譯者或贊助者的政治意識形態所宰制，這類被統治階層劃分為合法的經典化文學，往往與歷史上的重大事件或特殊的時空背景擁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司徒雷登的《在華五十年》回憶錄，翔實記載了擔任美國駐華大使的他，於1946到1952年間，在中國大陸目睹的重大政、軍、外交事件的印象和評論，以及他對中國政界人物的看法。他對國共兩黨的評價各有褒貶，甚至對共產黨部分作為深表同情與讚揚，然而他卻對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嗤之以鼻。有鑑於此，臺灣中譯本很快就獲得出版機會，中國大陸則遲至1982年。本論文旨在探討主導《在華五十年》中譯本出版的政治意識形態，並由譯文分析得出若干結論。

關鍵詞：司徒雷登、《在華五十年》、意識形態、翻譯、改寫

收件：2018年1月17日

修改：2018年8月10日

接受：2018年12月5日

# The Ideology and Politics of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Fifty Years in China* by John Leighton Stuart

Ming-che Lee

Manipulation theorists assume that translated literature can be correlated with other “co-systems” of the target culture, including the political system, given its attempt to adopt specific norms or policies so as to be subservient to the dominant political ideology. From this perspective, all translations are thought to deploy a certain degree of manipulation of the source text for a specific purpose. When translations are subject to the constraints of the ideologies of the translators or patrons in order to fit the target culture, the translated work will be categorized by the ruling class as being a legitimate member of this culture’s literary canon. This phenomenon is usually inseparable from major historical contexts. John Leighton Stuart’s memoir, *Fifty Years in China*, is not only a faithful account of what he had witnessed as former U.S. ambassador to China from 1946 to 1952, but it also records the major political, military and diplomatic occurrences in China along with his commentary on influential Chinese political figures. As a steadfast disciple of democratism, Stuart often expresses his sympathy with the Communist Party while at the same time making clear his detestation of Communist doctrines. Thus, while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his memoir quickly appeared in Taiwan, unsurprisingly it was not until 1982 had it obtained approval for publication in China. This paper looks closely at the dominant political ideologies and different forms of patronage that made possible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Fifty Years in China*.

*Keywords:* John Leighton Stuart, *Fifty Years in China*, ideology, translation, manipulation

Received: January 17, 2018

Revised: August 10, 2018

Accepted: December 5, 2018

## 壹、《在華五十年》在臺灣的查禁與出版

文化操縱學派主張翻譯必然受到譯者及贊助者的意識形態影響，慢慢構築起某種場域，左右譯者的選擇、策略和行動（Hermans, 1985）。當翻譯文學與譯入語其他系統（如政治制度）產生連繫後，將採取特定的規範<sup>1</sup>、行為和政策，以發揮預設之功能（例如為政治意識形態服務）（Even-Zohar, 1990; Toury, 1995）。這類因體制上的贊助者（如政黨、國家機器、獨裁政權等）的權力特許為合法的（legitimate）翻譯活動，往往與歷史上的重大事件或特殊的時空背景密切相關（Levefere, 1992）。

國民黨當局根據蔣介石於 1953 年發表的〈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於 1954 年展開文化清潔運動。該運動以掃除「黃色的害」（色情）、「赤色的毒」（共產黨）、「黑色的罪」（異議言論）為口號，欲將所有附共思想出版品連根拔除。不可諱言，整個 50 年代的臺灣，左翼文學活動失去了展演舞台，反共文藝猶如文壇的思想警察，主導了當時臺灣的主流詩學。翻譯文學被當權者視為一種協助傳播或控制思想的載具，自然不在話下。根據蔡盛琦（2010）對 1950 年代臺灣國民政府查禁圖書的研究，1958 年 8 月 8 日「保安司令部」查禁了由羅俊翻譯，文友書店出版的《司徒雷登回憶錄》（*Fifty Years in China—The Memoirs of John Leighton Stuart, Missionary and Ambassador*, 1954），查禁字號「宏實 0090」（頁 124）。這個版本的出版年月不詳，無法在國家圖書館的出版目錄中找到，譯者的背景資料也一無所獲，可見查禁行動進行地很徹底。根據警備總部 1966 年出版的《查禁圖書目錄》，1953 年以後圖書查禁一般是根據《出版法》、《戒嚴法》<sup>2</sup>及《臺灣

<sup>1</sup> 圖里（Toury）提出的三類翻譯規範中，先決規範（initial norms）是時代背景的歷史條件；預備規範（preliminary norms）則是主導翻譯開始前的宏觀因素，譯者對文本類型的選擇和翻譯行為的直接與否皆受制於此（Toury, 1995, pp. 56-58）。

<sup>2</sup> 1948 年 5 月 19 日公告修正後的《戒嚴法》第 11 條規定：「戒嚴地域內，最高司令官得取締言論講學新聞雜誌圖畫告白標語暨其他出版物之認為與軍事有妨害者」，參見國防部（1948）。

省戒嚴時期新聞紙雜誌圖書管制辦法》。該目錄大致分為「違反出版法」和「違反戒嚴法」兩部分。前者是臺灣省新聞處查禁，後者是臺灣省保安司令部和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負責查禁（臺灣警備總司令部，1966）。1953年保安司令部公布「報刊圖書審查標準表」，列出了四項「查禁注意的目標」，分別是：「危害主義」、「危害政府」、「洩漏軍事機密」及「危害社會風氣」。由於該標準的文字描述過於抽象，實際上的查禁範圍包山包海，無所不包，例如「轉載或摘錄共匪及投匪分子之言論及蘇俄作家之一切作品而不加批判者」（蔡盛琦，2010，頁86），因為不符合當局的中心論述，也必遭查禁。<sup>3</sup>

1949年10月31日，臺灣省政府訓令《公佈反動思想書籍名稱一份》，內容載明：

本省為反共復興基地，為實施反共教育，肅清反動思想之傳播，凡各書店出售及各級學校各社教機關圖書室陳列之反動書刊，均應予查禁封存。（楊秀菁、薛化元、李福鐘，2004，頁869）

訓令後附上《反動思想書籍名稱一覽表》，分類鉅細靡遺。其中，1948年由上海的海光出版社委託駱伯鴻翻譯的節譯本《史迪威日記》（*Diaries of General Joseph W. Stilwell, 1900-46*）就名列其中。史迪威曾任駐華美軍司令，他在日記中替蔣介石取了個綽號「Peanut」，嘲弄蔣氏就像個小傻瓜，甚至將他在黃山的行館戲稱為「Berchtesgaden」（希特勒住過的私人山莊）。

史迪威對蔣不敬，日記在臺灣被禁乃必然的結果。司徒雷登也寫過日記，時間橫跨1945年到1949年，在主要贊助人傅涇波及燕京大學

<sup>3</sup> 這項思想檢查工作實際上由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四組」主導。它是國民黨文工會的前身，主要工作為宣傳黨義與國家政策以及策劃各式文化運動。從「第四組」編印的《宣傳週報》中，可以看出它實際上查禁的是出版品中的「思想與知識」。國民政府遷臺後，以「文化檢肅和圖書查禁」為手段，企圖重建國家秩序（蔡盛琦，2010，頁108）。

美國校友會的推波助瀾下，委託陳禮頌翻譯，1982年由香港的文史出版社代為發行出版，書名《司徒雷登日記：美國調停國共爭持期間前後》，<sup>4</sup>《在華五十年》的大部分內容便取材自這本日記。單就《回憶錄》的內容來看，似乎尚未達到「報刊圖書審查標準表」所列出的查禁標準。因為司徒雷登在回憶錄中，雖偶有零星的批評，但他對蔣介石本人及國民黨的基本態度還算十分正面。1966年出版的《查禁圖書目錄》登載該書遭禁止的理由，是根據1953年7月修訂後公布的《臺灣省戒嚴時期新聞紙雜誌圖書管制辦法》第二條第三款：「為共匪宣傳之圖書文字」（轉引自臺灣警備總司令部，1966，頁193）。由於作者無法取得「文友版」譯本，難以釐清該書內容究竟是如何「為匪宣傳」。不過，從一件小故事或許能看出些端倪。1951年司徒雷登75歲誕辰，中華民國駐美大使顧維鈞獲邀參加，行前請示是否要以蔣的名義贈花，蔣回答說「不必了」，並加碼表示不歡迎司徒雷登來臺，不滿之情溢於言表。戒嚴時期臺灣雖然有不少盜用大陸地區譯本的情形，這類隸屬於「匪首匪幹及附匪分子之著作及譯作，以及匪偽書店、出版社出版之書刊」（臺灣警備總司令部，1966，說明頁1）一般是要嚴格查禁的。但是大陸上真正第一個譯本要遲至1982年才在北京出版，而且並非公開發行，所以作者研判這本回憶錄被禁，多半是源自蔣與他之間的私人恩怨。矛盾的是，1954年（英文原書出版同一年）陸續在《大華晚報》連載的「大華版」譯本及1955年出版的香港「求精版」譯本均為忠實譯本，兩者皆未迴避批評國民黨和蔣介石本人或贊揚共產黨的內容。按理國民黨當局可援引上述法條加以查禁，實際上卻又允許這兩個譯本流通，其中差別為何實不得而知了。

<sup>4</sup> 此書在中國大陸正式出版則遲至2009年，由黃山書社出版。該社為避免爭議，特地在「出版說明」中明言：「為了保持原書樣貌，對原本中的各種姓氏譯名、各種地理譯名予以原譯保留。即便如此，並不表示我們完全同意本書作者、譯者、校者的立場、觀點和文字旨意等」（司徒雷登，1992／2009，頁227）。

## 貳、《在華五十年》在中國大陸的譯介

司徒雷登在意識形態上站在自由主義與民主主義這一邊是無庸置疑的。這本回憶錄一直要到毛澤東辭世六年後的 1982 年，才由國營的北京出版社<sup>5</sup>刊印了「專供內部發行」的非公開譯本。該譯本中頌揚蔣氏及國民黨的文字有部分段落遭到刪除。另外，關於他貶抑共產黨或共產黨高層人物，或觸犯當時政治禁忌，或不利於共產黨歷史論述，有些保留全譯，有些則淡化處理或刪譯，但整體而言尚能保留原文風貌。「北京版」翻譯的基本方針在「譯者的話」中清楚地表明：

司徒雷登對中國事務的種種敘述幾乎都是片面的、歪曲的，<sup>6</sup>因而十分反動〔……〕在我們今天研究中美關係史、外國在華佈道事業的虛偽性、美蔣勾結的歷史和蔣王朝倒臺的必然性的時候，作者卻在其回憶錄中，從反面為我們提供了一些值得參考的資料。因此，本書按原文照譯，只刪掉了馬歇爾寫的序，胡適寫的導言，和大段吹捧蔣介石的個別章節。此外，附錄、索引、照片也沒有收入。（司徒雷登，1954 / 1982，頁 2）

平心而論，「北京版」譯文流暢可謂通達，大致上也如譯者聲稱地忠實譯出原文的意旨。這篇譯者的話無非是在合理化處理方式的動機。二閑堂網站主人「維一」<sup>7</sup>如此評論「北京版」：

在那個時代，中美關係，臺海關係勢同水火。〔……〕在這種情形之下，司徒雷登先生的這本自傳絲毫沒有可能與大陸的廣大讀者見面。〔……〕自七〇年代中期中美關係解凍之後，大陸逐步

<sup>5</sup> 北京出版社於 1956 年成立，屬於中共同有企業，直到 1995 年獲准擴充為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團。

<sup>6</sup> 粗體為作者所標，以下同。

<sup>7</sup> 「維一」只是筆名，本名黃其煦，中國著名考古學家，譯有《考古學一百五十年》。

接受和放寬境外史學文獻的有限進入，司徒雷登自傳的流入當屬自然。〔……〕值得注意的是，這本傳記中仍然還有許多觸犯當時政治禁忌的內容，所以在大陸發行的這本《司徒雷登回憶錄》只是一部內容經過取捨的刪節本，算不得「全本」。對於認真研究當年的歷史，並對歷史完整性有嚴格要求的讀者來講，不能不說是一種缺憾。（維一，2010，第5段）

接著他解釋了為何要將完成已久的周惠民譯本公開在二閑堂網站：<sup>8</sup>

這本《司徒雷登在華五十年》的回憶錄經惠民先生翻譯完成，卻久久不能通過當局批准付梓〔……〕為此，惠民先生徵得鐸若先生的同意，就商於我，提議將他全部譯稿的電子版本在《二閑堂》上刊佈，以嘉澤書林。（維一，2010，第24段）

事實上周惠民的版本發表只比官方允准出版的「海南版」早一個月而已，但「海南版」內容與「周惠民版」南轅北轍，顯然經過大幅刪除及改寫，可見官方審查的力道之大。隨著中國大陸逐漸改革開放，司徒雷登從當年家喻戶曉的帝國主義代表人物，搖身一變，成為大陸學術界深入研究的教育家（羅義賢，2005，頁3）。遲至2012年的陳麗穎譯本才算是大陸上一個比較完整的全譯本。不變的是，陳譯關於共產黨占據大陸的合法性，以及司徒雷登嚴詞批評共產黨部分，大抵還是選擇不譯或淡化處理。值得注意的是，陳譯並未完全不譯司徒雷登的任何批判，該版本刻意漏譯的部分主要集中在司徒雷登描述共產黨意識形態之惡，及該政權對中國這塊土地未來將造成的潛在傷害。其中也有少數漏網之

<sup>8</sup> 二閑堂網站成立於1997年，首頁的〈二閑堂記〉概述網站成立的原因：「今有萬維網行世，避靜則絕好，我等何不於網間結一草廬，邀集同好，詩文唱和，閒微知著，溫故知新，學通中外，史鑒古今，以圖快活？」但主人維一卻在此文中偷渡了傾民主思想：「頻繁選舉公僕乃存時時征取民情，俾使政府不致脫離民眾太遠之意。民主政治，效率頗低，花費甚鉅，然兩害取其輕，乃不得已而為之。」可見二閑堂的成立並不是單純談文論藝。參見維一（2010）。

魚，譬如陳譯第十五章「美中新局（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What Policy Now?”）」中，赫然出現諸如共產主義是「一個罪惡的大怪物」，而且「是個徹頭徹尾令人討厭的東西」等文字（司徒雷登，1954 / 2012，頁 209），如此毫不留情的惡言都獲得原文照轉。<sup>9</sup> 陳譯之後，大陸上又陸續出版了兩個譯本，分別是杜智穎譯本（司徒雷登，1954 / 2014）和李晶譯本（司徒雷登，1954 / 2015）。這兩個譯本的共通點是僅譯出司徒雷登的回憶錄全文，其他部分，包括作者自序、胡適導言及所有附錄等均未譯出。

## 參、司徒雷登與政治意識形態

司徒雷登，<sup>10</sup> 在華先後擔任過傳教士（1904—1925）、教育家（1919—1946）及駐華大使（1946—1952），在中國近代史上有其不可磨滅的重要地位。1904年12月，他啟程前往中國上海，展開數十年的傳教生涯。他的傳教方式比較傾向具現代性的自由主義，認為傳教士的責任不僅在「強調福音工作」，「更重要的是促進社會改革」（林立樹，2000，頁 10）。他對中國的教育事業也卓有貢獻，1919年2月，他接任燕京大學校長，積極推動「漢學研究」計畫。1979年鄧小平率團訪美，正式成員 21 人之中，燕大畢業生就占了七人之多（羅義賢，2008，頁 2）。足見司徒雷登對中國教育界的影響，無其他外國人士能出其右。

1928年他在南京結識了蔣介石，此後一直與國民黨和蔣氏維持著不錯的關係。<sup>11</sup> 由於他親華反日的立場，日軍曾將他監禁長達三年八個

<sup>9</sup> 原文為“Communism...is an evil monstrosity...it must be utterly objectionable.”。

<sup>10</sup> 複姓「司徒」是他給自己取的中國姓，與英文名字的譯音「雷登」合起來就是中文姓名「司徒雷登」（沈建中，2009，頁 1）。

<sup>11</sup> 例證如下：1937年司徒雷登在致燕京大學「托事會」（Yanching Board of Trustees）的信中，描述蔣介石「不論委員長有什麼缺點，但他是『一個偉大的人，在道德境界、在智慧力量以及在無私奉獻於國家方面不斷上升』」。西安事變後，司徒更盛讚「蔣作為一個精神領袖業已獲得人民『自發的仰慕』」；中日戰爭爆發後，司徒在寫給哈金森（Hutchinson）的信中甚至直接表明「自己成了『徹底的蔣的人』，願為蔣做自己能做到的一切」（轉引自林孟熙，2001，頁 56）。

月，直到日本戰敗後才獲釋。他在中美兩國之所以享有很高的聲望部分與此有關。

1946年7月，司徒雷登被任命為最後一任美國駐華大使，不料調停任務失敗，開罪國共雙方，他也因介入國共和中美關係過深，導致三方面對其評價都是毀多於譽（邵玉銘，1992 / 2003）。1949年8月18日，毛澤東發表一篇題為〈別了，司徒雷登〉的文章，抨擊美國支持國民黨發動內戰的政策。這篇長期被選為中共「全國中學語言統編教材」的「政論範文」，嘲諷他是「美國侵略政策徹底失敗的象徵」。此後他便以「美國對華文化侵略的忠實執行者」及「進行反對中國人民的各種陰謀活動」的形象受到共黨意識形態的抵制（毛澤東選集編輯委員會，1967，頁1380—1387）。直到中國改革開放之後，大陸學術界才逐漸突破「思想禁區」，逐步還原他的真實面貌。

研究司徒雷登的中國學者郝平<sup>12</sup>一方面讚揚他「對國民黨政府的腐敗行徑深惡痛絕」之義舉，一方面又斥責他：

從意識形態上對馬列主義帶著很深的偏見，並多次發表批判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言論〔……〕對國民黨反動派發動內戰持偏袒的態度。（郝平，2011，頁1—10）

常江<sup>13</sup>也嚴詞抨擊他「對共產主義的敵視和恐懼來自盲目和偏見」（常江，2010，頁296）。常江在他的譯本出版三年後受訪時說：

我會答應翻譯一本書，通常出於兩個原因，一是書的學術價值高〔……〕二是書的內容十分重要，對於歷史、社會和文化的變遷、議程有顯著的揭示作用。司徒雷登的回憶錄〔……〕就屬於後面

<sup>12</sup> 郝平曾任中共黨委常委、北京大學黨委書記、全國政協委員等職務，著有《無奈的結局：司徒雷登與中國》，為中共黨教育扎根著力甚深。

<sup>13</sup> 常江，中國著名文化傳播學者，曾任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網路文藝委員會委員，現任教於清華大學。

這種。這類文獻極其重要，關涉人們對歷史、社會與文化的理解，因此如果落入不負責任的譯者手中，將是知識的重大損失。

（轉引自張知依，2013，「翻譯是良心活」）

常江是不是一名「負責任的譯者」，留待下一節說明。總之，司徒雷登認為共產黨的意識形態與中國傳統政治哲學格格不入，而且「充滿暴力、壓迫和罔顧人權（violent, indifferent to human rights, and oppressive）」（Stuart, 1954, p. 4），因此在意識形態上，司徒雷登不可避免地與信奉基督教且立場親美的蔣介石走得更近一些。

1846年，馬克思（Marx）和恩格斯（Engels）在合著《德意志意識形態》（*The German Ideology*）挪用意識形態一詞，批評統治階級特意生產出這種虛假意識（false consciousness），用來扭曲人民對現實的認識，屬於統治階層用思想控制人民的上層建築（superstructure）的一環。法國哲學家阿圖塞（Althusser, 1970/1971）進一步闡述國家機器如何透過生產與再製意識形態，不斷召喚人民，以此建立統一思想體系的社會主體。可以說，意識形態本質上就是一種政治信仰的教條（political doctrine）（Vincent, 1992）。另一方面，以喬斯特（John T. Jost）為首的心理學家研究人類需要意識形態的原因，得出三類主要動機：認知性（epistemic）動機、存在性（existential）動機和關聯性（relational）動機。研究結果顯示，個人並非完全是被動接受意識形態的灌輸，某種程度而言，個人出於心理需求，譬如為了與社會群體內多數成員的政治立場保持一致以便獲得生存契機，而進行一場心理加工（Jost, Federico, & Napier, 2009; Jost, Glaser, Kruglanski, & Sulloway, 2003）。總而言之，政治意識形態是雙向滿足被統治者與統治者的需求，使社會形態趨於穩定的一種武器，再透過文學（或翻譯文學）來增強其效果。在高壓且單一政黨的絕對政治勢力壟罩下，經過精心改造翻譯的外國敵人作品，不僅深受當權者歡迎，對需要心理投射的特定讀者而言亦頗具吸引力。凡戴克（Van Dijk）從社會認知理論（socio-cognitive approach）的角度，將意

識形態定義為存在於個人認知中的價值觀、態度和規範。因此，意識形態會以某種型態再現於文本，其中隱含意識形態的語言成分也會協助強化並鞏固既有的意識形態（Van Dijk, 1995, pp. 21-22）。這個詞早期被音譯為「意德沃羅基」，經常被民國時期左翼或右翼文學家引用，前者如李初梨（1928）的名篇〈怎樣地建設革命文學〉<sup>14</sup>便主張文學可被視為意德沃羅基（ideologie）的型態之一，作為階級鬥爭的一種手段；後者如魯迅的〈題未定草〉。可見意識形態一詞引入中國文學語境之後，一直與政治息息相關。

## 肆、《在華五十年》的中譯脈絡

這本回憶錄記錄了司徒雷登在中國生活前後約 50 年的點滴，1954 年由美國藍燈書屋（Random House）出版。全書正文共 15 章，主要記載他的家世背景、傳教生活、對中國政界人物的看法以及他個人對時局、和中美關係的反思。正文前附上司徒雷登與馬歇爾的序言、胡適<sup>15</sup>的導言，以及附錄和索引，共廿餘萬字。由於司徒雷登身分特殊，所以英文原書出版隔日，即 1954 年 10 月 16 日，臺北的《大華晚報》便開始在報上逐日翻譯連載。出版贊助者《大華晚報》，據說是屬於蔣經國系的一份報紙（沈建中，2009，頁 205），創刊於 1950 年，由李荊蓀<sup>16</sup>（董事長）、耿修業<sup>17</sup>（發行人兼社長）和錢震等人共同創辦。《在華五十年》在《大華晚報》連載了一個多月（譯出前 13 章）後，於 1954

<sup>14</sup> 李初梨原名李楚離，1928 年加入共產黨，積極宣導無產階級革命文學。該文是革命文學理論的代表作品。

<sup>15</sup> 1954 年 10 月 16 日，即《在華五十年》英文原書出版隔日，毛澤東致函中共中央政治局，要求開展「反對在古典文學領域毒害青年三十餘年的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的鬥爭」（轉引自沈建中，2009，頁 105）。同年 11 月 8 日，郭沫若發表批判胡適唯心論的談話，中國大陸批胡運動就此展開。可以推測由胡適作序的《在華五十年》在中國大陸獲得出版的機會更加微乎其微。

<sup>16</sup> 李荊蓀 22 歲時加入國民黨，曾為文反對《出版法》，因在《大華晚報》發表「星期雜感」專欄得罪了特務當局被捕下獄。他曾自稱「一生忠黨愛國，服膺三民主義」（李荊蓀，1994，序頁 4），可惜晚景淒涼。

<sup>17</sup> 耿修業擔任《大華晚報》社長長達 30 年，曾兩度當選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

年 12 月 1 日發行單行本，書名《司徒雷登回憶錄：旅華五十年記》，譯者李宜培和潘煥昆。<sup>18</sup> 李宜培畢業於燕京大學新聞系，廣義而言也可算是司徒雷登的門徒，曾經擔任蔣宋美齡的貼身英文秘書；潘煥昆是著名報人，印尼華僑，這兩人都曾任國民黨中央通訊社英文編譯。

該書附上〈本報譯刊本書附言〉，發行人耿修業簡要說明譯刊《在華五十年》的用意：

我們決定譯刊此書的最初動機，可以說純粹是著眼於一種「新聞價值」。**〔……〕雖然其中有許多觀點不能為我們所苟同，但作者所提出的這份資料，無論如何是珍貴的。〔……〕從他的自序裡，以及在正文最後兩三章中，我們可看出他的反共決心和我們有相等的堅強，以他的純潔的人格和受尊崇的聲望，他的反共觀點必能在美國朝野產生重大的影響，這將不僅有助於中國，對他的祖國前途也是極有裨益。**（司徒雷登，1954 / 1954，頁 194）

有鑑於《大華晚報》及兩位主要譯者和國民黨深厚的淵源，儘管回憶錄中有部分指摘國民黨的內容，非晚報「所苟同」，但「大華版」除了刪去附錄及索引外，原文照譯，甚至沒有迴避批評國民黨或蔣介石本人的內容。譬如第 11 章第 14 節中，司徒雷登痛斥國民黨軍官貪污的醜態及軍隊的缺乏紀律；第 12 章第三節，司徒雷登拿國民黨腐敗無能的官僚體系和共產黨紀律嚴明、有效率且士氣高昂的組織作鮮明對比等內容，在「大華版」中均完整保留。陳康芬（2007）精細分析了國共兩黨在文藝控管上的不同點，她認為共產黨將作家與文藝生產直接納入國家社會體制是在：

建立文學社群的權力網絡，以文學資源或具相容性的文化意識形態來柔性收編可合作或不反抗的文藝知識分子。（頁 91）

<sup>18</sup> 其中第 13、14、15 章及第 12 章的一半，另由楊孔鑫及江德成兩人譯成。

而國民黨則訴諸威權與懷柔並進的兩手策略，「以國家合法的暴力機制限制民間的言論自由化」（頁91），因而強化了政治信條的主導力量。此書中譯本的翻譯出版史似乎也大致呼應了她的觀點。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在華五十年》在臺灣的翻譯出版雖然一方面頂著原作者反共意識的光環，另一方面實則冒著抵觸當局文藝審查政策的風險；相較之下，該書在中國大陸的出版雖命運多舛，實際上1982年出版專供共產黨內部研究的「北京版」反而因身為「反面教材」而保留了原文樣貌。最新的李晶和杜智穎兩個譯本之刪譯改寫處多到數不清，譬如第13章第七節中，司徒雷登給予蔣介石人格特質極高評價，杜智穎將整節刪光，李晶也僅保留了原文5%左右。李晶雖在「譯者序」中試圖為長期被中國人視為「美帝國主義代名詞」的司徒雷登平反，但也僅止於此了。

## 伍、《在華五十年》兩岸三地的譯本比較

作者目前蒐集到的資料，《在華五十年》共有九個中譯本，茲列表分述如下：

表 1

繁體中文版（臺灣、香港）《在華五十年》兩岸三地中譯本出版情況一覽表

譯者	年代	出版資訊	書名	備註（正文）
李宜培、潘煥昆 楊孔鑫、江德成	1954	大華晚報	司徒雷登回憶錄： 旅華五十年記	無明顯刪節
閻人峻	1955	求精出版社 （香港）	在中國五十年	無明顯刪節
不詳	1984	新象書店	司徒雷登回憶錄： 在中國五十年	疑為翻印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表 2

簡體中文版（大陸）《在華五十年》兩岸三地中譯本出版情況一覽表

譯者	年代	出版資訊	書名	備註（正文）
程宗家	1982	北京出版社 （內部發行、未獲 授權，現已出版）	在華五十年—司徒雷 登回憶錄	小幅刪節版
常江	2010	海南出版社	在華五十年	大幅刪節
周惠民	2010	「二閑堂」網站	司徒雷登在華五十年	無明顯刪節
陳麗穎	2012	東方出版中心	在華五十年：從傳教 士到大使	無明顯刪節
杜智穎	2014	江蘇人民出版社	原來他鄉是故鄉：司 徒雷登回憶錄	大幅刪節
李晶	2015	譯林出版社	在華五十年	大幅刪節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與「大華版」相隔一年出版的香港「求精版」，將原書分成上、下兩冊編排，它與「大華版」最大的差別在於它為閻人峻一人獨譯，譯筆前後風格一致，而且將原書四篇附錄全文譯出，分別是：〈關於馬歇爾將軍赴華使命之各項訓令〉、〈政治協商會議所通過之五項決議案〉、〈杜魯門總統特使（馬歇爾）本人對華局勢聲明〉及〈杜魯門總統對華聲明〉。這四篇附錄只有「求精版」跟「東方版」全部譯出，另「海南版」僅譯出〈馬歇爾代表團的指示〉及〈杜魯門總統對華政策聲明〉這兩篇，其餘版本則全部未譯出。

儘管閻人峻本人<sup>19</sup>與求精出版社均未留下譯序，不過從譯文研判，這個版本的政治立場與《大華晚報》較一致，基本向原文靠攏，因此下面的譯本分析僅以「大華版」代表。

<sup>19</sup> 關於閻人峻的來歷資料不足，目前僅知他最早的一部譯作可能是 1945 年重慶的中外出版社出版的《美國的途徑》（作者：W. L. Willkie），此書與司徒雷登回憶錄，以及他後來多部譯作一樣，都是講述基督教神學，或與教會有關的人物著述，大部分都在香港出版刊行。

由於司徒雷登的自序中有許多猛烈批判共產黨的文字，因此「海南版」和「李晶版」皆選擇不譯。「東方版」雖然大致譯出原文，卻刻意漏譯了一大段批判共產黨的文字。有趣的是，譯作時代最早，理應最保守的「北京版」反而忠實譯出。「求精版」對這類敏感的文字採取的態度是「原文照譯」，這應與當時香港仍屬英國殖民地有關。另外，周惠民 2010 年發表於二閑堂網站的譯本，與「大華版」和「求精版」同樣屬於比較忠於原文的譯本。周惠民（2010）在網站上呼籲說：

或許有心人可以將此譯本、1982 年的刪節譯本，以及本堂刊佈的漢譯全本互相對照，找出其中的差異，以瞭解這 28 年來中國出版界的開放與進步。（第 3 段）

他的期望不幸落空了，後期的幾個譯本事實上不進反退。即使是最新的李晶譯本，出版社也得先表明立場：

由於作者個人的成長背景、宗教信仰和政治立場等因素，書中的論述和觀點不盡正確，有些甚至偏頗，希望讀者在閱讀時予以注意。（司徒雷登，1954 / 2015，出版說明頁）

儘管文革以前有所謂「黃皮書、灰皮書」等僅供共黨高層參閱和批判的「內部發行」圖書，《在華五十年》仍無機會在大陸上獲得翻譯出版（沈建中，2009，頁 206）。直到 1972 年尼克森總統訪中，「中」美關係緩步解凍，中國大陸才漸漸放寬境外史學文獻有條件輸入。1979 年「中」美建交，三年後，由程宗家譯，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在華五十年——司徒雷登回憶錄》方以特殊的「內部發行」管道出版。當時改革開放不久的中國大陸普遍缺乏版權意識，何況這本傳記中充滿了許多觸犯當局政治禁忌的內容，注定是一本刪節本。跟「大華版」及「求精版」比起來，「北京版」刪去了胡適的導言、馬歇爾的序、司徒雷登自序及部分吹捧蔣介石的段落，連同所有附錄、照片及索引亦在刪除之

列。譯者程宗家特別寫了一篇〈譯者的話〉，將該書定調為「幫助讀者理解毛主席這篇文章（指〈別了，司徒雷登〉）的注腳」，稱司徒雷登為「中國人民的瘟神」，說他「對中國事務的種種敘述幾乎都是片面的、歪曲的，因而十分反動」，不過該回憶錄卻「從反面為我們提供了一些值得參考的資料」（司徒雷登，1954 / 1982，頁 1—2）。有鑑於此，「北京版」在當年自然無法公開發行。

「北京版」其中一個明顯的刪節處，出現在第六章第九節。這篇文章是司徒雷登引用自己在 1937 年 5 月 15 日發表於北平出版的《民主》（*Democracy*）雜誌上，題為〈蔣介石評說〉的一篇文章，譯者（或出版社）大筆一揮就整篇刪去。2015 年的李晶譯本同樣將之刪得一乾二淨。下面試舉一段比較三個代表版本的處理手法：

（原文）

It may be permissible to add a word in conclusion to the effect that the writer's personal contacts with General Chiang have led him through the same stages of opinion as the people of the country have been described as reaching, resulting in an unquestioning confidence in the transparent sincerity of *his patriotic purpose* [emphasis added] and in the *stern purity of his personal life* [emphasis added], an admiration tinged increasingly with affection, and a clear conviction that *China is extremely fortunate to have one with his character and capacity actively leading the nation in this supremely critical period of its rebirth and rebuilding* [emphasis added].  
(Stuart, 1954, p. 121)

（大華）

作者在這裡無妨再說幾句話作為本文結束。作者與蔣先生的個人間接觸，使作者在各階段中對於他的觀感完全無異於中國人民在上述同一階段中對於他的觀感，卒而對於他的**愛國心之顯明誠摯**

與他私生活之絕對清白，具有無容置疑的信心；對於他的欽仰則越來越含有愛的成份。中國在其更生與重建的最緊要關頭期間，能夠有他這樣一個有品格有才幹的人來積極領導全國，實在是極幸運的事。這一點是清楚無疑的。（司徒雷登，1954 / 1954，頁 73）

（海南）

最後請允許我加一句話。在和蔣司令私下接觸的過程中，我對他的印象也同廣大民眾一樣始終在不斷變化著，卻最終還是在他身上建立起了無可置疑的信念。（司徒雷登，1954 / 2010，頁 114）

（東方）

最後請允許我在結論上加上一句。在我和蔣先生的私下接觸中，我對他的印象也如中國一樣不斷產生變化，但是我還是對他產生了堅定的信心，相信他在愛國主義的宗旨問題上是透明和真誠的，個人生活上是嚴格而清白的。我也慢慢對他產生了欽佩的感情，堅信中國在這樣一個重生和重建的極其關鍵的時候，有一位具有這種人格和能力的領導人，是無比幸運的。（司徒雷登，1954 / 2012，頁 81）

「海南版」經過改寫和刪節後，原文中的讚美語氣完全消失，變得非常模稜兩可，令讀者無法得知司徒雷登對蔣介石究竟是褒是貶。「東方版」則選擇略加淡化後保留了原文。譯者常江（2010，2017）曾經公開表示：

四年前我協助引進並擔任翻譯的司徒雷登回憶錄《在華五十年》，經過複雜的審批程序和「必要」的刪節，終於要出版了。我竟然興奮得跳了起來。之所以興奮，並不因我負責的一項浩大

工程歷時四年終於告結，而是由於該書的出版或許預示著我們對一位重要歷史人物的評價正在趨於公正。（第1段）

常江口中的「審批」，指的應該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新聞出版總署」（2001—2013），後來改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2013—2018）。這個國務院轄下的機構實際上就是中共中央宣傳部，經常以違反〈出版管理條例〉<sup>20</sup>和〈圖書出版管理規定〉<sup>21</sup>查禁書籍。目前大陸國內圖書出版以自我審查為主，再經各省新聞局核可後才能出版。對共產黨的批評內容，「海南版」大約保留了五分之一的篇幅，其餘五分之四的內容因為較為辛辣，「海南版」選擇將之全部刪除。諸如共產黨如何「狡猾地」竊取大陸國土、共產黨欺騙式的土地重分配政策、宗教迫害等內容在「海南版」中完全看不到。其他較輕微的批評內容也一律經過淡化或甚至美化處理。譬如下面這個例子：<sup>22</sup>

（原文）

Until they had gained nation-wide (mainland) ascendancy, the Communist authorities governed in areas that they controlled with little manifestation of *totalitarian* [emphasis added] inclination; *they seemed to be benevolently disposed, tolerant and friendly* [emphasis added], on the principle: live, let live and help live. Their conduct as they moved in 1947, 1948, and 1949 to victory after victory and took control in region after region

<sup>20</sup> 第25條第3、4款規定，任何出版物不得含有以下內容：「泄露國家秘密、危害國家安全或者損害國家榮譽和利益的」以及「煽動民族仇恨、民族歧視，破壞民族團結，或者侵害民族風俗、習慣的」。參見2001年12月2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令 第343號〈出版管理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2001）。

<sup>21</sup> 第22條規定：「圖書出版實行重大選題備案制度。涉及國家安全、社會安定等方面的重大選題，涉及重大革命題材和重大歷史題材的選題，應當按照新聞出版總署有關選題備案管理的規定辦理備案手續。未經備案的選題，不得出版」。參見2008年5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新聞出版總署令 第36號〈圖書出版管理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新聞出版總署，2008）。

<sup>22</sup> 本段出自原文第13章第八節後半段，部分內容在譴責中國共產黨與馬列思想的道德低劣。李晶譯本只譯出客觀記錄歷史的前半段，後半段評論則全部未譯出。

and city after city was indeed that of *well-disposed liberators* [emphasis added]. And such it continued to be until they had established their domination over the mainland. In those days there came from China and from various “experts” many *glowing reports* [emphasis added] regarding the Communists. A large number of foreign Diplomats, businessmen and missionaries were confident that *the new regime was and would be a great improvement on the old* [emphasis added]. (Stuart, 1954, pp. 282-283)

(大華)

中共於其能控制整個大陸之前，對其所佔據的若干地區的統治，並未露出**極權專權**的傾向。他們似乎頗為**和善、寬大和友好**。他們的原則是生活、讓人生活、協助人民維持生活。當一九四七年、一九四八年及一九四九年，他們不斷的贏得勝利，不斷的佔領一處又一處的地區及城市時，他們的行為確乎是一個**和善的「解放者」**的行為，直到他們在整個大陸上建立了統治時，這種行為方告停止。在這一段期間，從中國國內及各個「專家」方面，傳出了許多有關共產黨的**動人報告**。許多外國的外交官、商人及傳教士也都相信**新政權遠比舊政府為佳**。（司徒雷登，1954 / 1954，頁 173）

(北京)

在共產黨當局取得全國（大陸）勝利之前，他們對其控制地區的統治很少表現出**集權主義**的傾向；他們似乎是**仁慈的、寬容的、友善的**，他們的原則是自己活，讓他人活，而且幫助人家活。1947年、1948年和1949年，當他們節節勝利，佔領了一個又一個的地區、一座又一座的城市的時候，他們的所作所為確實是受人歡迎的**「解放者」**的行動。這種情形一直保持到他們在整個大

陸建立政權為止。在那些日子裡，從中國和各種各樣的「專家」發來了許多讚揚共產黨人的報導。許多外交官、實業家和傳教士都確信新政權現在是而且將是對舊政權的一大改進。（司徒雷登，1954 / 1982，頁 271）

（海南）

在全面控制中國大陸之前，中共在其統治的地區甚少表現出集權主義的端倪。他們聲稱自己的原則是：讓自己生存、讓他人生存，幫他人生存。從 1947 年到 1949 年三年間，他們攻城掠地、無往不勝，確實被很多人當成了「救星」。這種情形一直持續到全國政權建立。那段日子裡，從中國和各色「專家」那裡發來了許多盛讚共產黨的報導。許多外交官、商人和傳教士都堅信新政權大大強於舊政權，前景一片光明。（司徒雷登，1954 / 2010，頁 256）

原文的 totalitarian 這個字，被「北京版」與「海南版」刻意淡化譯為「集權」，而非「極權」。根據線上版牛津大字典的定義，totalitarian 當形容詞使用時，專指「中央集權的、獨裁的政府，老百姓需全面服從國家的權威」（Totalitarian, 2018）。這與「集權主義」（centralism or authoritarianism）在內涵上有根本的不同。centralism 的定義僅止於「政治權力集中於中央」；authoritarianism 則是政治權力集中於少數人（一般為政黨），所有決策、權力、皆由執政黨「一黨專政」，所有政治權力並非個人所能壟斷（也就是說，獨裁者不存在），也沒有其他政黨共享權力。一字之差，失之千里。原文中讚揚共產黨的 glowing reports 在「大華版」變成了「動人的報告」，「求精版」更絕，稱它是「充滿生氣的報告」，著實令人莞爾。此外，「海南版」將原文平鋪直敘的史實描寫加油添醬，說共產黨「無往不勝」、「被很多人當成了『救星』」、「前景一片光明」云云，均為原文所無。

回憶錄中有一段提醒讀者共產思想的危險性和實施民主優勢之處的文字，出現在第十章第 16 節最後一段，直接挑戰共產黨的核心信仰。上一節中曾略述政治意識形態在形塑社會集體意識的統治力，常江、杜智穎和李晶的版本將這段全部刪除。除了「東方版」略加修飾之外，其餘四個版本大致都依原文翻譯。礙於篇幅，以下僅比較「北京版」跟「東方版」的差別：

#### （北京）

共產黨的策略所造成的危險確確實實存在著。要避免這種危險，最可靠的辦法是，在民主事業的領導人中開展廣泛的宣傳工作〔……〕要是老百姓對民主問題採取聽之任之的態度，那麼，這樣的民主將永遠是不可取的。唯一的拯救辦法是，更廣泛地講民主，給老百姓以做人的權利。只有在老百姓相信他信仰的生活方式有價值，要不惜代價地去維護它時，才能防止共產黨人進行**陰險的滲透**，抵制他們的**極權主義**哲學和不擇手段的行事方法。  
（司徒雷登，1954 / 1982，頁 207）

#### （東方）

來自共產主義的威脅的確是很真實的，〔……〕但是消除這個威脅最保險的方法是這樣組成的，充分和自由的資訊公開〔……〕如果人民都不關心政治的話，那麼民主只會是個壞東西。其他更多的民主制度裡體現的一個唯一正確的道路就是民眾決心維護自己的權利。只有人民堅信他們自己的生活方式，並且願意用一切代價來捍衛自己的價值觀，那樣的話整體上的**集權主義**思想以及不道德的不擇手段才不會得逞。（司徒雷登，1954 / 2012，頁 145）

原文中不斷強調民主的可貴，人民擁有捍衛自由的權利等等，在陳

麗穎之後的三個新版本完全消失。有譯出原文的其餘五個版本中，「北京版」反而是文字最洗鍊，同時最能完整表述原文意旨的版本，甚至比「大華版」和「求精版」更「堅決捍衛民主」。「東方版」也只刪去原文「共產黨人陰險的滲透」（Communists' insidious penetration）和淡化「極權主義」（totalitarian philosophy）兩處。這個譯例透露出什麼訊息呢？不譯其實也是一種意識形態的展現。新保守主義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1989年發表了〈歷史的終結？〉（The End of History?）一文。<sup>23</sup>他認為隨著冷戰結束，「自由民主」可能形成「人類意識形態進步的終點」與「人類統治的最後形態」，甚至構成「歷史的終結」（福山，1992 / 1993，頁1）。然而從司徒雷登回憶錄在中國大陸的出版史觀之，福山的預言終究沒能實現。海南版譯者常江（2010）聲稱他在翻譯過程中，已竭力做到了客觀與公正：

以一種近乎學術研究的嚴謹來向我的同胞們展示這本被歷史的煙塵湮滅了近半個世紀的珍貴史料。（頁294）

事實上遠非如此。2010年8月24日，常江在《中國青年報》上發表〈司徒雷登的三張面孔：傳教士與政治家身分相牴觸〉，他說：

當年毛澤東主席的一篇〈別了，司徒雷登〉彷彿為司徒其人畫上京劇臉譜，幾十年來他變成了一個符號——**能指是司徒雷登四個字，所指是十惡不赦的美帝國主義**。尤其令人傷感的一點是，過去60年來，始終未給這位燕大校長任何講話的機會……**這樣看來，半個多世紀後，《在華五十年》中譯本的公開發行，恰是還歷史以澄澈的最好方式。**（文化新聞版）

<sup>23</sup> 這篇論文後來發展成專書《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Fukuyama, 1992）。

此話說得很動聽，但是大幅的刪減與改寫要如何「還歷史以澄澈」，非具有充分的想像力恐怕難以辦到。

## 陸、結語

文化轉向後的翻譯研究，說明了翻譯的過程難以保證絕對的中立，控制翻譯活動的機構或贊助人感興趣的往往是意識形態的部分，導致原作被改寫甚至重寫。從《在華五十年》譯本分析可以得知，統治階層（贊助者）為了鞏固政權，推廣符合統治利益的意識形態，或避免統治權威受到不必要的挑戰，特地挑選相對有利的文本，加速其翻譯出版；或設下重重壁壘，以阻止、審查、變造、刪節及改寫等手段，確保譯本「政治正確」。然而，意識形態從生產、流通、再製到滲透人心，並不全然是單向進行的。個人也可能出於心理需要，為了融入社會主流意識形態而需要這類文藝作品的餵養，翻譯便在這過程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意識形態對翻譯的干擾，與翻譯對意識形態的強化或弱化，是一個雙向複雜的過程。《司徒雷登回憶錄》的翻譯史正提醒了我們：意識形態不會有走向終結的一天。

## 參考文獻

### 中文文獻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新聞出版總署（2008）。圖書出版管理規定。取自  
[http://big5.www.gov.cn/gate/big5/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9/content\\_1399850.htm](http://big5.www.gov.cn/gate/big5/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9/content_1399850.htm)

【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Press and Publication. (2008). *Administrative provisions on book publishing*. Retrieved from [http://big5.www.gov.cn/gate/big5/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9/content\\_1399850.htm](http://big5.www.gov.cn/gate/big5/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9/content_1399850.htm)】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2001）。出版管理條例。取自 <http://www.gapp.gov.cn/govpublic/83/81282.shtml>

【State Counci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01). *Regulations on the administration of publication*. Retrieved from <http://www.gapp.gov.cn/govpublic/83/81282.shtml>】

毛澤東選集編輯委員會（編）（1967）。別了，司徒雷登。載於毛澤東選集（第四卷，頁1380—1387）。北京：人民。

【Mao Zedong Xuanji Bianji Weiyuan Hui. (Ed.). (1967). Bei le, Situleideng. In *Selected works of Mao Zedong* (Vol. 4, pp. 1380-1387). Beijing, China: People's Press.】

司徒雷登（Stuart, J. L.）（1954）。司徒雷登回憶錄：旅華五十年記（李宜培、潘煥昆、楊孔鑫、江德成譯）。臺北：大華晚報社。（原著出版年：1954）

【Stuart, J. L. (1954). *Situleideng huiyilu: Lühua wushí nián jì* (Y. P. Li, H. K. Pan, K. X. Yang & D. C. Jiang, Trans.). Taipei, Taiwan: Great China Evening New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54)】

司徒雷登（Stuart, J. L.）（1982）。在華五十年——司徒雷登回憶錄（程宗家譯）。北京：北京。（原著出版年：1954）

【Stuart, J. L. (1982). *Zai hua wushi nian: Situleideng huiyilu* (Z. J. Cheng, Trans.). Beijing, China: Beijing Publishing House.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54)】

司徒雷登 (Stuart, J. L.) (2009)。司徒雷登日記：美國調停國共爭持期間前後 (陳禮頌譯)。合肥：黃山書社。(原著出版年：1992)

【Stuart, J. L. (2009). *Situleideng riji: Meiguo tiaotingguo gong zheng chi qijian qian hou* (L. S. Chen, Trans.). Hefei, China: Huangshan Shushe.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92)】

司徒雷登 (Stuart, J. L.) (2010)。在華五十年 (常江譯)。海口：海南。(原著出版年：1954)

【Stuart, J. L. (2010). *Zai hua wushi nian* (J. Chang, Trans.). Haikou, China: Hainan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54)】

司徒雷登 (Stuart, J. L.) (2012)。在華五十年：從傳教士到大使 (陳麗穎譯)。上海：東方出版中心。(原著出版年：1954)

【Stuart, J. L. (2012). *Zai hua wushi nian: Cong chuanjiaoshib dao dashi* (L. Y. Chen, Trans.). Shanghai, China: Orient Publishing Center.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54)】

司徒雷登 (Stuart, J. L.) (2014)。原來他鄉是故鄉：司徒雷登回憶錄 (杜智穎譯)。南京：江蘇人民。(原著出版年：1954)

【Stuart, J. L. (2014). *Yuanlai taxiang shi guxiang: Situleideng huiyilu* (Z. Y. Du, Trans.). Nanjing, China: Jiangsu People's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54)】

司徒雷登 (Stuart, J. L.) (2015)。在華五十年 (李晶譯)。南京：譯林。(原著出版年：1954)

【Stuart, J. L. (2015). *Zai hua wushi nian* (J. Li, Trans.). Nanjing, China: Yilin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54)】

李初梨 (1928)。怎樣地建設革命文學。文化批判，2，1—17。

【Li, C. L. (1928). *Zenyang di jianshe geming wenxue. Wenhua Pipan*, 2, 1-17.】

- 李荊蓀（1994）。星期雜感。臺北：時報文化。
- 【Li, J. S. (1994). *Xingqi zagan*. Taipei, Taiwan: China Times.】
- 沈建中（2009）。走近司徒雷登。濟南：山東畫報。
- 【Shen, J. Z. (2009). *Zoujin Situleideng*. Jinan, China: Shandong Pictorial Publishing House.】
- 周惠民（2010）。司徒雷登在華五十年。取自 <http://www.edubridge.com>
- 【Zhou, H. M. (2010). *Situleideng zai hua wushi nian*. Retrieved from <http://www.edubridge.com>】
- 林立樹（2000）。司徒雷登調解國共衝突之理念與實踐。臺北：稻香。
- 【Lin, L. S. (2000). *Situleideng tiaojie guo gong chongtu zhi linian yu shijian*. Taipei, Taiwan: Daw Shiang.】
- 林孟熙（2001）。司徒雷登與中國政局。北京：新華。
- 【Lin, M. X. (2001). *Situleideng yu Zhongguo zhengju*. Beijing, China: Xinhua.】
- 邵玉銘（2003）。傳教士教育家大使：司徒雷登與中美關係（馬凱南、湯麗明譯）。臺北：九歌。（原著出版年：1992）
- 【Shao, Y. M. (2003). *An American missionary in China: John Leighton Stuart and 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 (K. N. Ma & L. M. Tang, Trans.). Taipei, Taiwan: Chiuko.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92)】
- 郝平（2011）。無奈的結局：司徒雷登與中國。北京：北京大學。
- 【Hao, P. (2011). *Wunai de jieju: Situleideng yu Zhongguo*. Beijing, China: Beijing University Press.】
- 國防部（1948）。戒嚴法。取自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F0070002>
-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 (1948). *Martial law*. Retrieved from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F0070002>】
- 常江（2010年8月24日）。司徒雷登的三張面孔：傳教士與政治家身分相牴觸。中國青年報。取自 <http://www.chinanews.com/cul/2010/08-24/2486520.shtml>

【Chang, J. (2010, August 24). Situleideng de san zhang miankong: Chuang jiaoshi yu zhengzhijia shenfen xiang dechu. *China Youth Daily*. Retrieved from <http://www.chinanews.com/cul/2010/08-24/2486520.shtml>】

常江（2017年4月25日）。司徒雷登與《在華五十年》。取自 <https://book.douban.com/review/8499899/>

【Chang, J. (2017, April 25). Situleideng yu *Zai Hua Wushi Nian*. Retrieved from <https://book.douban.com/review/8499899/>】

張知依（2013年8月9日）。令主流頭疼的光芒——《阿桑奇自傳》譯者常江專訪。北京青年報。取自 <http://book.douban.com/review/6203993/>

【Zhang, Z. Y. (2013, August 9). Lin zhuliu touteng de guangmang: *Asangqi zizhuan yi zhe Changjiang zhuanfang*. *Beijing Youth Daily*. Retrieved from <http://book.douban.com/review/6203993/>】

陳康芬（2007）。政治意識形態、文學歷史與文學敘事——臺灣五〇年代反共文學研究（未出版之博士論文）。國立東華大學，臺灣。

【Chen, K. F. (2007). *Ideology, history and narrative: The societal research of Taiwan's anti-Communism literature in 1950s*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National Don Hua University, Taiwan.】

楊秀菁、薛化元、李福鐘（編）（2004）。戰後臺灣民主運動史料彙編。臺北：國史館。

【Yang, S. G., Xue, H. Y., & Lee, F. Z. (Eds.). (2004). *Zhanhou Taiwan minzhu yundong shiliao huibian*. Taipei, Taiwan: Academia Historica.】

福山（Fukuyama, F.）（1993）。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李永熾譯）。臺北：時報文化。（原著出版年：1992）

【Fukuyama, F. (1993).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Y. C. Li, Trans.). Taipei, Taiwan: China Times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92)】

維一（2010）。寫在漢譯《司徒雷登在華五十年》的前面。取自 [http://www.edubridge.com/situleideng/weiyi\\_situ.htm](http://www.edubridge.com/situleideng/weiyi_situ.htm)

- 【Wei, Y. (2010). Xie zai hanyi *Situleideng Zai Hua Wushi Nian de qianmian*. Retrieved from [http://www.edubridge.com/situleideng/weiyi\\_situ.htm](http://www.edubridge.com/situleideng/weiyi_situ.htm)】  
臺灣警備總司令部（編）（1966）。查禁圖書目錄。臺北：作者。
- 【Taiwan Garrison Command. (Ed.). (1966). *Prohibited books*. Taipei, Taiwan: Author.】
- 蔡盛琦（2010）。1950年代圖書查禁之研究。國史館館刊，26，75—130。
- 【Tsai, S. Q. (2010). The suppressed publications in the 1950s. *Bulletin of Academia Historica*, 26, 75-130.】
- 羅義賢（2005）。司徒雷登與燕京大學。貴州：貴州人民。
- 【Luo, Y. S. (2005). *Situleideng yu Yanjin daxue*. Guizhou, China: Guizhou People's Press.】
- 羅義賢（2008）。司徒雷登與美國（戰後——1949年）對華政策。北京：中國文史。
- 【Luo, Y. S. (2008). *Situleideng yu Meiguo (zhanhou—1949) dui hua zhengce*. Beijing, China: Chinese Literature and History Press.】

#### 英文文獻

- Althusser, L. (1971). 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In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pp. 127-186) (B. Brewster, Trans.). New York, NY: Monthly Review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70)
- Even-Zohar, I. (1990). The position 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within the literary poly-system. *Poetics Today*, 11(1), 45-51.
- Fukuyama, F. (1992).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NY: The Free Press.
- Hermans, T. (1985). *Manipulation of literature: Studie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London, England: Croom Helm.
- Jost, J. T., Federico, C. M., & Napier, J. L. (2009). Political ideology: Its

- structure, functions, and elective affinities. *Political Review of Psychology*, 60, 307-337.
- Jost, J. T., Glaser, J., Kruglanski, A. W., & Sulloway, F. J. (2003). Political conservatism as motivated social cognition.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29, 339-375.
- Levefere, A. (1992). *Translating,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London, England: Routledge.
- Stuart, J. L. (1954). *Fifty years in China: The memoirs of John Leighton Stuart, missionary and ambassador*. New York, NY: Random House.
- Totalitarian. (2018). In *Oxford Dictionaries* online. Retrieved from <https://en.oxforddictionaries.com/definition/totalitarian>
- Toury, G. (1995).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 Amsterdam, the Netherlands: John Benjamins.
- Van Dijk, T. A. (1995). Discourse analysis as ideology analysis. In C. Shaffner & A. Wenden (Eds.), *Language and peace* (pp. 17-33). Aldershot, England: Dartmouth.
- Vincent, A. (1992). *Modern political ideologies*. Oxford, UK: Blackwell.

